

1981—2016

**教育发展趋势分析与
改革建言文集**

——国际比较的视角

王一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2016

**教育发展趋势分析与
改革建言文集**

——国际比较的视角

王一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81—2016 教育发展趋势分析与改革建言文集：国际比较的
视角 / 王一兵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 - 7 - 5161 - 8026 - 6

I. ①1… II. ①王… III. ①教育事业—发展—中国—
文集 IV. ①G5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29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 莉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9.75
插 页 2
字 数 669 千字
定 价 1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潘懋元先生序

我认识王一兵教授算起来已 30 多年。80 年代初，我经常应邀参加教育部政策研究室所召开的一些研讨会，其后又被聘任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王一兵教授则是研究室和发展中心的领导之一。只是由于他经常外出活动，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一般是在中心所召开的几次国际研讨会和内部讨论会上，听过他简短的发言，包括 1992 年夏天那一次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颇有争论的研讨会。每次会上，他话虽不多，但那充满自信、铿锵有力的发言，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所组织、编译的《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前后出版五集）和《七十国教育发展概况》等书，是我当年常置案头浏览查阅的重要资料。

交往比较频繁，是他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总办事处高等教育专家之后。1995 年他委托厦大高教所承办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后又约请我们编撰介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专文；1998 年邀请我到东京参加他所主持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政策国际研讨会；我所主持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1999 年）讨论知识与高等教育、第六届年会（2001 年）讨论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保障体系，他都亲临指导并做学术报告，使这两届年会能够较好地与世界高等教育理念衔接并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中国的延伸，提高了年会的学术水平与国际影响。在这期间，我们较多地谈论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理念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意义。确切地说，是我在聆听他的高见宏论。他于 2002 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国际比较的视角》论文集，就是这一时期他的重要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世界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全球化社会和学习型社会转型之际，高等教育界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应当树立什么理念？解决什么问题？如何使高等

教育“融入未来世界的全球知识社会”，“促使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这些思考，集中体现于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及其所通过的《展望和行动宣言》和《优先行动框架》等文件中。而这次大会，据我所知，王一兵教授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员，是亚太地区一级会议和相关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在中国，高等教育更是面临着来势甚猛的新挑战：迎接知识社会的来临，高科技与低素质在人才培养上的矛盾将日益凸显；电子信息技术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学过程与教学模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加快，经费及其他教育资源短缺、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教育质量保障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入WTO后，如何应对全球化国际市场培养人才、改革体制。如此等等，都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决策者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而在面临挑战和战略选择时，都需要把握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势，借鉴世界高等教育的理念和经验。

这本论文集所选论文近80篇，是王一兵教授1981年到教育部、1993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退休回到国内至今35年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也是他用全球视野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我国教育35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进行追踪、求索、评论和建言的一个见证。王一兵教授的这些论文，结合中国的实际，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法人化，现代开放远程教育、现代信息交流技术推动教育改革和创新、全球性知识经济对大学法人化的诉求，以及新世纪的素质教育等。他的很多论述、预测和建言，对于思考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挑战与现实问题，仍然给人以启发和借鉴。这本论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对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的决策有拓宽视野的作用，转变观念，做出比较正确的抉择。

王一兵教授曾在2002年论文集“前言”中说：“明年退休前再也不写长文了。”那就是说，退休之后，将可以更专心地从事研究工作，观察形势的变化，总结所积累的经验，写出长篇巨著，以飨读者。果然，这本即将出版的新文集中近2/3的论文都是他在2003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后的新作。我对此表示祝贺，并赠此序。

潘懋元

2015年9月11日于厦门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高等教育处处长 迪亚斯博士序

我是在 1991 年 9 月于澳大利亚阿密泰尔召开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研讨会上认识王一兵教授的。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形势进行 5 年反思的第一次会议，并形成和出版了后来的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第一份政策文件（1995 年）。在这次会议上，王一兵教授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深刻理解和分析，他的工作能力和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通过与来自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百名候选人的竞争被教科文组织于 1993 年招聘为高等教育计划专家，负责在有 44 个会员国、广阔而十分多样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执行教科文组织的高等教育计划。他在为教科文组织服务的 10 年中所表现出来的献身和革新精神，他长期在中国高等学校、中央教育决策部门和研究机构及巴黎常驻团的各种位置上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他后来为会员国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对促进各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出色地完成教科文组织赋予他的使命，都证明是极其宝贵的。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办事处和日本文部省及两个国际机构合作，在远离曼谷的东京召开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大会，为 1998 年将于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做准备。这次大会开得十分顺利和成功，并对筹备巴黎的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王一兵教授一个人承担了这样一个有 300 多人参加、上百位部长和大学校长出席的大会的几乎全部的组织协调工作。他在亚太办一个人承担的同样分量的工作任务，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是由几位专业人员组成的研究所或中心完成的。作为他曾经的上级领导和一起工作的同事，我们的六年共事给我留下十分愉快的回忆。

难能可贵的是，王一兵教授总能挤时间并在百忙中专注于阅读、思考和研究。王一兵教授曾于 1986—1989 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

代表团参赞。他利用这一机会对西方发达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于回国后成文发表,对于国门刚开、急于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本国改革发展进程的中国来说,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好评。他于 1993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在众多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讲话,并对会员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产生了良好影响。王一兵教授深爱自己的国家,心里总是想着自己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题,勤于思考,笔耕终身,并提出他的建言,供决策当局参考。我很高兴地听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把这些论文和讲话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值得庆贺的事。我相信,他在文章中关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法人化、网络化的挑战,信息交流技术快速发展及其推动开放远程教育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教育改革和革新的引领和战略作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学位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和国际化办学等问题的论述,对政策制定者、大学管理人员、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教授和学生,仍然可资借鉴并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直到 1991 年在澳大利亚认识王一兵教授之前,我与他素不相识。我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教处处长 20 年,招聘过来自各国的数十名专业人员,招聘来自中国的王一兵教授是最富争议、时间拖得最长,而最后证明王是人品、工作、业绩最好的一位,因而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他以自己的专业水准、勤奋工作、严谨作风、广结人缘、组织策划能力和出色地创造性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消除了人们对来自一个国门刚开的中国人能否胜任联合国的专业职务的怀疑,并获得了亚太地区众多国家高教部门和大学的赞赏。从教科文组织在曼谷的亚太办事处到巴黎总部,从授予王一兵教授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合作奖的泰国大学部到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教育部门和大学,对他的工作和为人,都可谓有口皆碑。我退休以后,教科文组织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延长了他的任期。

谨以此表达我对王一兵教授的论文集在中国出版所表示的祝贺。

马尔科·安东尼奥·迪亚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高等教育处处长

2015 年 9 月 10 日

前 言

198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在其历史上第二次从外交部划归教育部管理。我原定调外交部工作，后来我选择了去教育部，其间还有个小故事。老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文革”中在清华住“牛棚”时我帮过他一点小忙，被他记住。1981年，他刚刚重新就任教育部长，得知我即将去外交部后，力荐我到教育部工作。我考虑到自己在学校做了3年学生，11年教师，6年党委副书记，前后20年，还是对学校和教育了解得多一些，便做了以上选择。那年7月1日，我到教育部报到，南翔同志和时任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彭佩云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话，希望我先到政策研究室工作，好尽快熟悉情况。从这一天开始，我便与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后来单位和岗位几经变动，一晃也已36年，76岁，但关注和从事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趣和初衷始终未变。近来梳理了一下，竟发现从1981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一篇短文开始，前后写的并值得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报告、建言达76篇，可以为证。有趣和始料未及的是，正当我去年底完成了致袁部长和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一份建议书和关于开放大学的一篇短评以后准备就此搁笔时，接到北外和《神州学人》杂志的共同邀请，望我就国家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教育谈点看法。盛情难却，再撰短文。离开北外36年，常驻、与会、周游近50个国家和地区，笔耕不辍，此文竟成我笔耕终身的压轴之作，并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了我阔别几载的母校和离别很久的专业领域，深感人生莫测，有时还真有点戏剧性。

这本文集洋洋洒洒五十万言，涉及从国际教育发展大势、国家教育领域的大政方针到某个学校的办学方略，林林总总，似乎有点庞杂。不过，我经过盘点发现，虽然76篇文字主题各异，文有长短，论有深浅，但我

的行文和建言始终没有离开两条主线：一是紧盯、追踪、发现、分析、传送国外和国际上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向国人发出自己的警示，期望给国人以启迪；二是围绕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同时期的热点和战略问题，融入自己所了解、理解的国情，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建言，期盼自己的国家能通过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升国力和全体国民素质，赶超发达国家，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就把这本文集称为《1981—2016 教育发展趋势分析与改革建言文集》了。文集副标题还加了个“国际比较的视角”，有点广告味，无非想呼吁国人关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当然，斗胆加上，也并非全无自信。此生在一所高校学习工作 20 年，有幸到教育部工作，处 13 亿人口大国教育事业的中枢 13 年，常驻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 13 年，走访诸多国家，组织和参与 200 多个国际会议，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同行和友人，阅读来自各国的文件、报告、书刊可谓汗牛充栋。因此，当我提出某种值得注意的国外教育发展动向和趋势时，多少总有点根据，绝非空穴来风。当然，准确与否，准确性多大，只能由行家评论，由历史最终判定。

我的研究、求索与建言同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与难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向与趋势息息相关，也同我的工作变动、工作重点、研究兴趣和人生经历的变化紧密相连。因此，文章虽有 76 篇之多，但可轻易地划分为以下五个聚焦领域。

一是国外教育情况介绍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运行机制的研究，时间集中在从 1981 年开始到我 2003 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积 10 多篇文稿。我到教育部，正逢我国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发现，各行各业任何一个具体事项的成功改革，都不能不触及几十年形成的体制机制问题，或要求体制机制作相应的创新或改革。封闭了几十年后国门洞开，国人一出国门，所见所闻，皆感新鲜。因此，在学界和政府部门出现了一个我称之为言必谈机制、言必问国外的盛况。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甚至一个学校要建一个电教室，都要问问国外是如何搞的，都要派一个团组到国外考察一下。80 年代，我曾连续三次随教育部领导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教育报告、资料，也有较多机会接触外国同行并与之切磋，我在 1993 年前发表的 10 多篇文稿和出版的两本书籍中，除第一篇外，皆为介绍国外教育发展程度、成绩、水平、体制、机制、制度、政策和问题、挑战、改革、创新、举措、

战略,包括国外普遍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等。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我1986—1989年期间在巴黎常驻的两年多时间和与各国教育同人的广泛接触、交流,也得益于浏览、研读教科文组织包括总部亦在巴黎的经合组织教育方面的大量的文献资料,使我有可能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运行机制和体制问题研究,基本上弄清了这些国家教育运行机制中国家、市场、社会 and 学校的定位、功能、责任和它们相互激励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弄清了国人翘首以待的大学自主在这一体制中的重要性、功能、边界、领域、法律依据和保障,所面临的挤压、挑战和制衡。1989年回国后,我就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教育运行机制体制问题及其可资借鉴的地方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为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决策吹进了一丝新风,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其中四万多字的长文《发展与机制、挑战与对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教育发展变革述评与比较》,在收入《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现状及展望》一书于1990年出版后,1991年又被《教育研究》、1993年再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5年后,我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教授来函,说他和他的博士生都认为“这篇文章现在看看仍然很好”,希望允许将此文收进由他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发展评论》第1期。

20多年过去了,国家包括大学变化之大,令国人和世人皆有点目瞪口呆。我二十几年前在撰文中还只是谨慎地建言可以考虑在我国高校教师招聘、薪酬、激励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引进某些市场手段,如今大学管理中能使用市场手段的已经没有不使用这一手段的了。更有甚者,商业化之风亦吹进了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的灵魂、精神、理念、办学、育人和文化。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是,大学自主权至今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仍然没有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一方面,大学翘首以待自主权回归,能自主办学,以此激活自身活力和潜力,以因应急剧变化的社会,保证学生获得因应这种变化、适应劳动市场需求和个人未来发展的起码的必备的人格、知识、能力、技能和潜力等素质,培养国家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对落实高等教育法已经明文规定的大学自主权,则慎之又慎,担心一放就乱,一旦乱了无法承担责任。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就凭一句“乱了咋办”就能吓阻不少也主张给大学办学自主权但对大学自主权的实质、边

界及应具备的机制、体制、法治等条件不甚了了的领导。这种放与收的非良性循环过去几十年中已不止一次发生过。依本人愚见，仍然如本人 20 多年前所建言的，要从根本上、长远地解决大学自主权问题，就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运行了上百年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从界定国家、市场、大学和社会的功能、责任、权限和相互关系的边界开始，明确能保障大学活力、动力、潜力发挥的必备的起码的自主权限，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守法、执法，逐步建立起这四个部分既相互激励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和体制，并在这一进程中解决大学自主权问题。非如此，就不可能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再收”的尴尬。没有法律和相应机制体制保障的大学自主权的回归和落实，创新型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包括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将难以落到实处，甚至无从谈起。这也是我准备搁笔之时再次于 2016 年初向教育部领导提出高校放权如何走出“怪圈”的建议的原因和基本出发点。

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时间从 1993 年起，历时 20 多年，积 20 多篇论文。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发现国民经济经过长期“左”倾路线尤其是“文革”的磨难以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通过盘点向国人介绍的大量国外教育发展的数据以后同样发现，我国当时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我是带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众多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跨进教科文组织大门的。当我发现我国高等教育 90 年代早期的入学率在亚太地区 40 多个国家中仍然只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不丹等一起垫底时，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管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地区高等教育项目的官员，对我的刺激可想而知。我利用我的有利条件，挤掉了大量的休假和休闲时间，花了近四年工夫，写出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并在发表前送呈中国教育部长及相关领导。从这里开始，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主题，包括高等教育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先后写了 20 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推动和评价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如何通过转变理念和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应对对大众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质量瓶颈、毕业生素质和就业、国际化、法人化等挑战。其中《建立合理、公正、透明、权威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质量保证的保证——国外趋势和中国面临的战略选择》（2001 年）和《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2006 年）

两篇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后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一篇2007年还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收入名人演讲录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深知，围绕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争论还将继续。我更坚信，不管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和挑战，1999年中国政府启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上百年的只培养不到同龄人5%的少数人的精英性质，改变了高等教育发展落后于我国高速现代化进程的被动状况，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处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和在亚洲垫底的尴尬局面，是顺应世界潮流之举，是影响我国未来历史进程的战略举措，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金色一页，功不可没。我为我曾为此摇旗呐喊感到幸运。

三是开放远程教育、电大转型升级和开放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从在国内发表我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1996年德黑兰年会上的讲话开始，20多年，有文稿30多篇，超过文集文稿数1/3。我对这一领域有点情有独钟，原因有二。一是当我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不久了解到澳大利亚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把全国7个远程教育中心皆合并到传统大学中去，利用传统大学的师资、课程优势，教授同样的课程，颁发同样的学历文凭，同时又影响和促使传统大学实行双模式办学，促使传统大学变得开放、灵活，较好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并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州立大学则是实行完全双模式办学的成功典型。从1997年开始，我在不同场合指出，澳高等教育这种普遍的双模式办学可能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未来。1998年，在上海电大组织的国际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这一看法，并呼吁我国电大同仁对可能来自传统高校方面的竞争要有充分的准备。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参加会议坐在台下的英国开放大学校长，也就是过了几年成了我在教科文组织的领导的丹尼尔爵士立即上台反驳，认为开放远程教育是开放大学和电大的领地，传统大学进入这一领域是“越位”。在我后来的会议总结讲话中不得不指出，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两年后，中国教育部批准65所传统大学举办网络学院，一下子改变了中国远程教育的生态。我相信，一旦高等学校可以自主设置网络学院，电大、开放大学的生存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近年出现的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领衔建立的三大MOOCs平台更增强了我对这一趋势预测的信心。人们纷纷邯郸学步，或争相建立自己的平台，选择课程上网，或赶紧乘上美国的三辆“大巴”，

恰恰忽略了这三所大学都在自己的平台上声明的一大宗旨：通过 MOOCs 推动学校自身的改革，改变依靠单一的传统的面授教育模式，试行学校的双模式办学和推行混合式学习，促进办学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模式的创新。我不止一次撰文指出，这才是 MOOCs 的灵魂，也是 MOOCs 带来的最大启示之一。学其表而舍其里，如同已诞生了 10 多年的网络学院一样，与本校的关系是两张皮、双轨制，而不是整个学校办学的双模式探索，学校主体的办学仍然遵循传统大学的理念、模式和质量观运行。而在这一方面，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电大和开放大学与新技术融合的广度、深度、效益，在以此推动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创新、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恰无可争辩地走在了中国所有高校的最前列。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强调，包括在最近呈送教育部综合改革司的报告中一再重申：推进电大转型升级和开放大学建设和创新的意义超过其本身。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用开放、灵活、包容、终身等先进理念指导，通过改革创新营造一个宽松的机制、体制和政策环境，支持电大适时转型升级，办好开放大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体系，对于在我国普及教育，推进终身教育，提升全民素质；对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对于大范围地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全民创新意识和创新文化；对于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都具有不可估量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条真正的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教育的路子，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我为中国电大几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十分敬重这条战线上涌现的为开放远程教育事业振兴而贡献毕生精力的“拼命三郎”式的领导、干部和教师；我更对他们长期处于的边缘状态，所走道路之艰辛和面临的诸多掣肘表示同情甚至不平。人们如果看看我的这一部分文稿，我的以上心境，文中表露无遗。是对是错，是正是邪，留待后人评说。

文集中还有书评、序言和访谈类文稿近 20 篇，绝大多数涉及开放远程教育，推介国际远程教育界名家的理念、论述、成就、影响，更多的是为各种有影响的大型国际会议文集作序，重点阐明通过某次会议带来和反映的国际上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重大动向和趋势，改革、创新的亮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及教训等，同一般的书序不太一样，因此决定收入本文集。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开放远程教育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行程和发展以后，在国务院、教育部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近

年来迎来了新曙光、新纪元。先是国家教育发展纲要（2010—2020年）写上了沉沉的亮亮的六个大字：“办好开放大学。”不久，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广东五省市电大先后转型升级为开放大学。这不仅激起了近10万电大人、开大人跟上新的形势、更新理念、创新模式及办好开大、电大的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极大地调动了省市政府支持和办好开放远程教育的积极性。当然，惯性和争论还会有。重要的是，人们期盼已久的光明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2016年初“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教职〔2016〕2号文）的颁发，标志着我国开放大学黄金时代和战略机遇期的到来。作为一个学者，我为有幸参与这一发展变化的进程感到宽慰。

四是涉及素质教育，有三篇自以为各有侧重和特色的文章。我以为，强调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性质并以此指导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无疑是根治我国教育竞争过度，青少年、学校、家长压力过大，以致严重扭曲了教育目的和教育伦理本身的痼疾的良方。但理论界为此炒得沸沸扬扬，一度把素质教育越拔越高，越说越玄，以至于广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日常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是不是、算不算素质教育都成了问题，使身处一线的校长、教师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我历来关注“热点问题”，也有兴趣参与“热点”问题讨论。2000年，我参照当时国际上关于21世纪对人的素质要求的一些共识，写了《何谓素质和21世纪对人的素质要求》一文，曾先载新华社内参，后以采访报告登新华社《瞭望》杂志，再以论文发表在苏州大学《教育论坛》。2006年，我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亲自发起的美日教育比较为例、为据，写成《素质教育：只有走出理念误区，才能破解困局——从日本美国之间教育比较说起》一文，揭示了我国理论界一些人在素质教育的界定和理念上的误区，自我感觉还有点根据和说服力，希望有助于破解困局，把中小学校长、教师从困局中解脱出来。2011年，应母校要求，写了一篇回忆性稿子《学校教育 with 多变人生》，借我自身大学所学几乎皆非我职场所用的经历作为个案，谈我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学校教育与学生素质生成的内在联系和价值所在。我十分赞赏爱因斯坦关于何谓教育的一句名言：教育就是学校里学的忘光了以后还剩下的东西。我不知道，我的个案是否够格作为他的名言的一个小小的验证。

五是既非评论，也非杂文，而是纯粹关于某些具体政府单位、具体学

校办学如国际化办学路径、国际活动规划、组织、国际奖项竞得等具体事务性的建言，历时 20 多年，积十几篇文稿。我以为，理论研究之大忌是脱离实际，甚至为了保险，有意回避实际。比较教育研究，多为国别或国外情况介绍，难见全面、深入、深刻的比较和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建言。我的工作性质、工作经历和关注时政的习惯注定了我的研究和写作很难“无感而发”。我主张“接地气”：我的观察、求索、比较、研究的论断，如果有人有兴趣试试，我在学校、在教育部、在国际组织打拼了一辈子摸索到的一点知识、技能和经验、教训，如果有人希望借助一下，我皆乐此不疲、诚心诚意、全力以赴。条件是相互之间有个起码的信任、诚意和尊重，有一定的连续性。我与几个学校，皆前后历经几任领导，历时十几二十年，以诚相待，尽心尽力，还真的做成了不少事情，不少事情的效果常常超出预期，包括协助浙江大学承接和运行全球大学革新联盟亚太秘书处、上海开大承办全球巨型大学峰会、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及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与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校企合作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和合作协议签署、云南中国南亚教育论坛的举办和云南开大国际化办学战略的形成等。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和奖项的取得，根本在于学校的努力，在于学校的事情本身做得漂亮，否则一切皆无从谈起。当然，经验也表明，做得好不等于一定拿到奖，尤其是国际上的大奖。在国内做得好，也不等于在国际上得到同等认可。这种合作，学校高兴，我有成就感，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和信任，也建立了感情。出乎我的意料，上海开大 2010 年 50 周年华诞，全校员工推选得奖人选时竟全票通过授予我特殊贡献奖，将一个不在学校名册上的人排全校得奖名单之首，让我感动不已。事已往，境已过，我仍然决定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建言放入这本集子，无表功之意，乃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有的建言仍有一定的针对性，如国际职员培养。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据了解，按照我国不断大幅增加的会费，目前该组织来自中国的职员仅占我国应得名额 1/3，占得的高级职位更是凤毛麟角，与我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实难相称。问题仍然是国际职员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储备、机制、制度和政策问题缺乏通盘和长远考虑，这正是我十几年前应我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要求提出的相关建言所谈及的问题。二是一些建言涉及技术层面的经验和注意事项，如大学国际合作与国际化办学的分野、规划的制定、国际活动的组织、所谓国际

游戏规则的理解和遵循、电大转型升级的准备等，对以后想做同类事情的学校或单位，也许仍有一点参考价值。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大部分收了进来。

写那么多有用吗？朋友聚会，总有好心者得知我退休后仍在“爬格子”如是问。问得中肯、问得尖锐、问得我不能不对自己笔耕一生做点反思。76岁留下76篇文稿，长短不等，质量参差不齐，错误论点和不当建言恐不在少数，但毕竟凝聚了我毕生的心血和思考。我决定出这个文集，不仅是想留个终生求索、笔耕的印记，也以此画个句号，更希冀更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同人能继续关注、追踪和研究我提出的动向、趋势和问题，提出更多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建言，以利国家、国民和社会。

回想起来，我在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似乎就是一件事、一个字：写。写大块文章，写领导讲话、文稿，写国家报告，写调研报告，写部发文件，写会议纪要，写国外参考资料等。我参加会议和出差不多，但送呈的文稿鲜有被推翻或退回。记得1986年秋随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杨海波同志参加教科文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大会上午通知，下午中国代表团可获得一个10分钟的大会发言的机会。当场准备会议发言稿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身上。时值教科文组织40华诞，但面临美苏恶斗、美国退出、经费大减、情绪低迷的困境。在我即席准备的手写的两三百页的演讲稿中，引用了我国也是世界文化名人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古训，相信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渡过当前难关，迎接新的更好的未来。海波同志讲完后，会场气氛为之一振，掌声经久不息。海波高兴，我也有点得意。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刚走出国门，要在国际舞台上掀起如此激情，得到如此掌声，并不多见。我知道，我成了政策研究室一个“壮劳力”，几次工作有可能调整都被领导挡驾。41岁满头黑发来到教育部，几年工夫便白发丛生，开始手臂酸痛，一直延续至今，有时疼得难以入睡。到了教科文组织后，一个人管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44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及远程教育项目，工作对象是部长、校长、教授，不得有半点疏忽、疏漏，工作压力极大，在办公室间走动，几乎都是小跑。这10年写出来的文字真是挤出来的、压出来的，常常是在节假日、在车站、在机场、在飞机上草就。有朋友亲人一见面就劝我，别写了，写了没用。我知道，他们好心，写了没用也非无稽之谈。我犹豫

过，但终究没有把笔放下。我以为，有用无用，相关因素太多，不取决于我。我的笔耕，至少可以留下我的拳拳赤子之心、人生轨迹，良心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我还以为，写的东西是否有点用，也还取决于你是否有点勇气触碰“热点”、“是非”，取决于你的论点、论断是否有根有据有说服力，取决于你的建言是否较充分地考虑了中国国情，取决于你是否做过一点换位思考，如想一下领导和领导机关决策时常常面临的两难、多难局面及多方挑战和一旦做出决定就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压力。我的幸运在于，我从学校基层到教育中枢、从国内到国外的经历使我对以上各点多少有点体验和了解，并成为我选题、取材、研究、构思、建言、撰稿的基本思路和指导。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投下的不少文稿，在浩瀚的中国教育文论大海中，也曾激起过一点浪花：据我不太完全的了解，我的文章先后有六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多篇被《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研究》等两个或以上重要学术刊物转载。《历史机遇与高等教育决策——再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在《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5期发表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还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01年论文一等奖。出席1998年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陈至立部长在巴黎告诉我，《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一文她看了，而且也叫别人看了。2006年夏《中国电大的定位和走向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道路——国外经验和国际比较的视角》一文发表后，主管高等教育的时任副部长吴启迪教授通过现在的副部长、当时的高教司负责人林惠青同志专门代表其来电向我表示感谢并希望以后多提建言。当时即将上任的中央电大校长也两次来电表示要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我有幸两次随周济部长出席教科文组织部长峰会，为其准备文稿。2016年我把我领衔完成的关于开放大学及其体系建立的调研报告送呈袁贵仁部长后，袁部长很快作了批示，要求教育部相关领导和司局根据我们的报告对即将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修改。我于2016年初提交的关于如何走出高校放权“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怪圈的建议书也得到了袁部长的批示和重视。我想必须说明的是，我与这些部长们皆素昧平生。他们对我写的某些文字的兴趣皆出于工作考虑，无非是我提供的某些信息、分析、建言对他们考虑相关问题时能起点参考作用。手臂还疼，而且每写完一篇总要疼一段。但每当我听到文章登了，转载了，还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关注或争议，相关部门亦有反应，我也就感到满足了，手臂虽疼，值。